

文明

20世纪欧洲史

[美] 加布里埃尔·杰克逊 著 余昌楷 李佳 译

与

Civilization and Barbarity in
20th-Century Europe

東方出版社

20世纪欧洲的文明包括：人类有史以来最具革命性的科学进步；信息爆炸；在学术和音乐方面最有独创性的运动；以及建立福利国家，为普通公民提供比过去的任何文明都要多的各种机会。它还在以下方面实现了民主化：传统知识和艺术文化；以及大众传媒娱乐、旅游和美术的大众化。它目睹了人权、宗教和种族容忍观念的逐渐扩大。但20世纪的欧洲也有野蛮的一面，它目睹了人类有史以来最具毁灭性的两次战争；建立了一大批专制、独断和无能的独裁统治。如此巨大的成就和如此具有破坏性的暴行并存的局面，我们该怎样去理解呢？从这些判若两样的事件中我们能学到什么呢？

著名历史学家加布里埃尔·杰克逊在本书中探讨了过去一百年间欧洲的政治和文化史。但本书不是仅仅聚焦于政治和经济发展的简单的编年史，而是涉及了20世纪的所有发展以及国际关系（和平的与好战的）的所有重要方面。读者可以把本书看做是了解欧洲的文化、价值和未来，以及适用于或强加于作为一个整体的人民的生活方式的必不可少的背景材料。作者在讨论艺术、政治和科学时，指出了民主和多元化的欧洲当前的重要性和可能的未来。清晰的剖析使本书成为学者和非专业人员共同理想读物。

文明与野蛮

20世纪欧洲史

[美] 加布里埃尔·杰克逊 著 余昌楷 李 佳 译

Civilization and Barbarity in
20th-Century Europe

東方出版社

责任编辑:陆丽云
特约编辑:万 琪
装帧设计:曹 春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明与野蛮——20世纪欧洲史/[美]加布里埃尔·杰克逊 著;余昌楷,
李佳 译. —北京:东方出版社,2010. 8

ISBN 978-7-5060-3937-6

I. ①文… II. ①杰… ②余… ③李… III. ①欧洲-现代史-20世纪
IV. ①K50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22155号

Zivilisation und Barbarei Europa im 20 Jahrhundert
(INSEL VERLAG)

Civilization and Barbarity in 20th-Century Europe

© 1999 Gabriel Jackson

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1-2005-1874

文明与野蛮

WENMING YU YEMAN

——20世纪欧洲史

[美]加布里埃尔·杰克逊 著 余昌楷 李佳 译

东方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环球印刷(北京)有限公司 新华书店经销

2010年8月第1版 2010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本: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张:24.75

字数:350千字 印数:0,001-5,000册

ISBN 978-7-5060-3937-6 定价:50.00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前言

在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纪里，欧洲的两次具有巨大毁灭性的战争给欧洲自身——以及世界上的其他许多地方——带来了深重的伤害。希特勒等的独裁统治是欧洲自有史载以来所经历的最无道的专制。在对犹太人、吉普赛人及凡能搜出的斯拉夫人所发起的种族灭绝行动中，纳粹（主要是德国人，但亦有其追随者助纣为虐）仅仅因为人种而不是因为这一种族的所思所为——或者是以莫须有的罪名——就对人类挥舞屠刀。在苏联极度扩大化了的大清洗运动中，几百万人被诬谋反，屈打成招，然后遭到流放或杀害。还有一些党派中的民族主义者以爱国的名义让他们当中的少数派成为牺牲品，这种迫害相比而言就更为平常，公开得也更少。

然而，这也是一个伟大的科学发现与艺术创作不断涌现的世纪。从1895年发现放射现象以来，欧洲的物理学家们开创了后来席卷全世界的精密科学创新浪潮。欧洲还是现代艺术领域超现实主义和抽象派的发祥地，而其新的音乐表达则远远超越了从巴赫到勃拉姆斯的那个只讲究音正韵平的时代。最后，欧洲的“福利国家”（即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上的国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所发展起来的模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大多数非共产主义国家大都效仿这一模式），比之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其他多元社会，更多的欧洲人享受了一种更高的生活水平，

拥有更广泛的“生活方式”的选择。

应该如何去理解如此辉煌的成就和如此毁灭性的暴力的结合？从这些性质截然相反的事件中又能得到什么样的启示？作为历史学家，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无论一个人有着怎样的偏好和兴趣，要了解任何一个社会，都必须理解其经济基础、政治体制、权力更迭间的关系。但在本书中，我对道义、智力和艺术遗产的关注程度，超过对经济力量和政治权力的关注。当然，我必须问：推动欧洲成为全球经济和科技主导力量的动力有哪些？又是什么原因导致在一个单一的文明里竟发生了如此可怕的战争和文化冲突？

但是，对人类的未来更重要的，却是探究以下诸现象之源：希特勒之恶，斯大林之暴，爱因斯坦与毕加索丰富的创造力，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与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Boris Pasternak）对道义的追问。假如我们今天所知道的欧洲有朝一日忽然被一场核战争、一次瘟疫，或者某种不可控制的人口或生态变化打得万劫不复，欧洲会留下什么值得纪念的回忆？不管是从善还是恶的角度，哪些事件会被我们看做是可堪后人效仿的传世典范，哪些是应该避免的灾难？

正是这种普遍的道德拷问，使我动了写本书的念头。我不同意现时某些多元文化主义者对欧洲历史的影响所作出的蔑视性的评价，他们认为，欧洲的历史，或者广义上讲欧洲的文明，只不过是一个“死去的白人”的纪念碑。在我看来，欧洲是一种人类文化，不是白种人生物学。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已经从种族歧视和帝国主义的统治下解放出来，并且获得了发展和自我肯定，它们自然强调自己的特色，常常包括对长期以来“白人的负担”所作出的反应，这种反应成为一种“种族主义反正”。

我相信，人类中的任何一个种族都可以产生爱因斯坦、莫扎特或希特勒。我们有大量的证据表明，各个种族的人重视欧洲在科学、音乐和美术方面所作出的贡献，不亚于他们对遭到欧洲压迫而引致的强烈感受。在情感和知识能力上，我们都属一个人类种群，都能够反思——以及借鉴——这个非同寻常的世纪的

历史，而这段历史，正是本书的主题。

在此对本书的参考书目和脚注略加说明。我非常感谢我在40余年的教学生涯中所使用过的教材和通用说明。这些书的作者包括：卡莱顿·J·H·海斯(Carleton J.H.Hayes)；赛里尔·布莱克(Cyril Black)和E.C.赫尔姆赖克(E.C.Helmreich)；钱伯斯、哈里斯和贝利(Chambers, Harris, and Bayley)；保罗·贝克(Paul Beik)和劳伦斯·拉福(Laurence Lafore)；R.R.帕尔默(R.R.Palmer)、H.斯图瓦特·休斯(H.Stuart Hughes)、雷蒙德·阿伦(Raymond Aron)、戈登·克雷格(Gordon Craig)、沃特·拉克(Walter Laqueur)、阿诺·梅耶(Arno Mayer)以及威廉·麦克尼尔(William McNeill)；克莱恩·布林顿(Crane Brinton)、彼得·盖(Peter Gay)、乔治·莫斯(George Mosse)、卡尔·肖斯克(Carl E. Schorske)的智力史；编辑《现代欧洲的崛起》丛书(*Rise of Modern Europe*)的威廉·兰格(William L. Langer)；莫里斯·克劳泽特(Maurice Crouzet)编辑的《人民与文明》系列(*Peuples et Civilisations*)；战后德国史学家卡尔·布莱切(Karl Dietrich Bracher)、马丁·布罗扎特(Martin Broszat)、汉斯·蒙森(Hans Mommsen)及其弟子的作品。对我非常有价值的还有，泰晤士·哈德逊公司出版的《艺术世界》丛书(*World of Art*)中《新葛洛夫音乐百科全书》(*New Grove Dictionary of Music and Musicians*)，《牛津简明科学词典》(*Oxford Concise Science Dictionary*)，及企鹅出版社1987年修订版艾萨克·阿西莫夫(Isaac Asimov)的《科学新向导》(*New Guide to Scienc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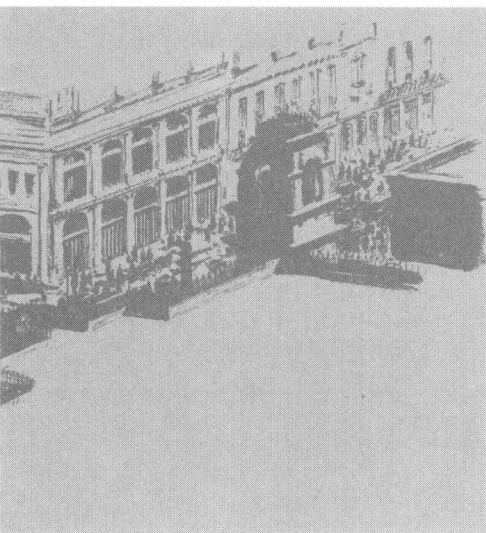
但是，这是一本对历史事实进行了整合与诠释的书。我在脚注中没有列出在我的叙述中出现的“主流”事件、政治与经济理论、条约、宪法及立法。我对每一个欧洲国家或历史上的每一个十年也并未试图一视同仁。注解说明的是关于更小的国家或特殊地区、特殊主题的资料来源；尤其是，它们把读者的注意力引向那些可以在大学图书馆找到的月刊或季刊，但它们的文章标题并不像所有书籍的标题那样可以在网上提供的目录中找到。

我尤其要感谢第五章中几位科学家同事的评论——他们是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 chemist 拉塞尔·杜利特 (Russell Doolittle) 和物理学家诺曼·克罗尔 (Norman Kroll), 布兰迪斯大学的鲁宾斯坦项目教授亨利·林斯齐 (Henry Linschitz), 他已经退休。还有几位人文主义者同仁——丹·阿隆 (Dan Aaron)、拉尔夫·本尼特 (Ralph Bennett)、米米·柏林 (Mimi Berlin)、阿诺·梅耶 (Arno Mayer)、托马斯·梅茨格 (Thomas Metzger), 以及安德烈·希夫林 (André Schiffrin), 他们给我提出的建议, 使我获益之深可能连他们在提出建议的时候都想不到。在写本书期间, 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杰拉尔德·费尔德曼 (Gerald Feldman) 和理查德·赫尔 (Richard Herr), 以及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戴维·林格罗斯 (David Ringrose) 的交谈, 给了我极其宝贵的反馈意见。我在巴塞罗那的朋友艾都尔德·阿莫罗斯 (Eduard Amorós)、安东尼·罗塞尔 (Antoni Rosell) 在电脑使用上给了我极大的帮助; 而《人文书丛》的里克·斯兹考尼 (Rick Szykowny) 准确地表达了我的文章内涵。我获得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教工研究委员会的允准, 让我到那里讲学 (我在那里讲授历史和人文科学达18年。) 最后, 我深深感谢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巴塞罗那中央大学以及德国葛根汉马普研究院的图书馆工作人员在参考书上给我提供的帮助。

加布里埃尔·杰克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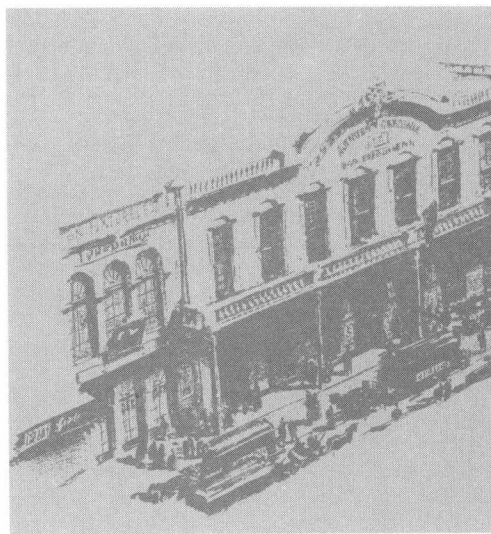
于巴塞罗那, 1999年3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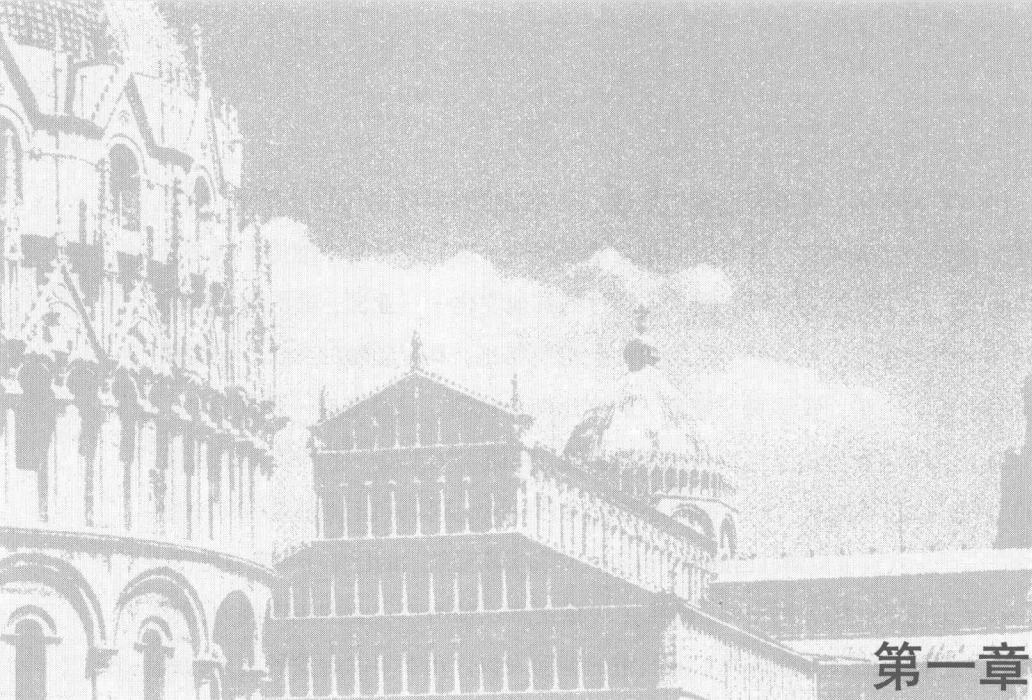
目 录



- 1 前 言
- 1 第一章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欧洲
- 25 第二章 第一次世界大战
- 47 第三章 不稳定的和平与恢复
- 75 第四章 法西斯主义与保守派专政的潮流
- 99 第五章 科学革命（1895—1939）
- 125 第六章 美术与音乐（1895—1939）
- 151 第七章 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与民主
- 175 第八章 第二次世界大战（1939—1945）

195	第九章 德国占领欧洲 (1940—1945)
221	第十章 福利国家 (1945—1990)
241	第十一章 苏联帝国 (1940—1991)
265	第十二章 科学与时代思潮 (1940—1990)
293	第十三章 创造性的文学
315	第十四章 德国和中欧、东欧的冷战
343	第十五章 20世纪欧洲的反思
367	后 记
371	重要名词翻译对照表





第一章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欧洲

—— Europe before the First World War

1914年的欧洲，曾被普遍看作是这个已知的世界最有生气的一部分，这就是经济发展、军事威武、科学独创和艺术多样性。这种情况至少维持了两个世纪。的确，由于欧洲文化同欧洲人接触过的其他文化——亚洲、非洲和美洲印第安——相对静止的经济学、技术和社会组织相比，具有勃勃的生机，作为西方历史本质的变革、发展和“进步”的广泛理性预测，只会变成一种优势。

为了说明这种勃勃生机及其固有国际性，我们不妨重温一下19世纪工业革命的历程：这场革命从其原来的中心英国和西北欧迅速而和平地蔓延到地中海沿岸并广泛深入到俄罗斯以西的整个欧洲大陆和奥斯曼统治的巴尔干半岛各地区。

和平工业革命的先决条件，已经在19世纪末以前由于农业的生产能力而得到实现。这样就能够养活新兴工业城市的劳动人口。几十年以后发展起来的铁路和蒸汽船，使得西欧国家能够从俄罗斯和美洲进口小麦。在19世纪期间，欧洲人口翻了两番，而且到1900年，他们吃的和穿的在某种意义上比上个世纪初还好。而对于那些没有从新的经济增长中受惠的人（或宁愿选择外出冒险的人）来说，想移居美洲和澳大利亚去开始新的生活，也就有了可能。

至于许多欧洲人的民族关系问题，工业革命就是一个一体化的进程。在头几十年，英国、苏格兰、威尔士和比利时的工程师、技术员、工厂领班和会计员不断被雇佣来帮助法国和德国企业家建设钢铁厂、纺织厂以及建设铁路（尊重英国人的习惯左边通行），伴随着铁路的建设，我们可以从德国小字辈诗人卡尔·贝克（Karl Beck）大约写于1840年的赞美诗中体会到一种快感：

因为铁路是新娘的手镯，
纯金的结婚戒指；
国家好比情人可以调换，
而婚姻关系犹存。^①

^① Quoted in T.S.Hamerow, *Restoration, Revolution, Reaction: Economics and Politics in Germany, 1815-1871*(New York, 1958), p. 8.

至19世纪后半期，法国、瑞士、奥地利、德国的工程师和商人又加入英国、比利时人的队伍，把新技术传到意大利、伊比利亚半岛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并把落脚点定在了匈牙利、波兰和俄罗斯的欧洲部分。

这种欧洲人的内在发展，并不像亚洲和非洲同时进行的、粗暴的殖民化那样，是赤裸裸地剥削。法国人、德国人、捷克人、巴斯克人、加泰隆人和意大利的工人，同英国和西北欧工业革命的先驱者们一样，拥有多数手工艺技术、工具使用知识、劳动纪律经历和有组织的工作、抗议的能力。对于商业管理人员和会计人员来说，情况也一样。因此，在欧洲的许多民族中，所有阶级都很快就学会，并且在几年之内就完全有能力继续使他们自己的商业和工业发展起来。

在欧洲，还有一股持续不断的、数量可观的移民潮。不仅是他们国内的农民流向城市，而且有波兰人流向普鲁士的农场、鲁尔的工业区和法国的煤矿；意大利人流向法国、瑞士和德国；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石匠流向北欧的建筑业；德国农民和技术员流向匈牙利、罗马尼亚和帝国时代的俄罗斯。由于他们在工作效率和生产率方面的好名声，在当地政府的眼里，他们成了受欢迎的移民。

再者，在这些年里，在整个欧洲，旅行自由一般是不受限制的，并不像20世纪那样有那么多不愉快的、人们所熟知的自由贸易和人员流动障碍，诸如关税壁垒、货币限制、签证和护照等等。的确，大致直到1880年，整个欧洲大陆都倾向于低关税和放宽对跨越国界的限制。多数提现银行在操作上和资本自由通关方面都是国际化的。金本位创造了诚信和国际支付的可流动性。当然，与此同时，欧洲内部工业革命发展之迅猛，同19世纪以来欧洲的经济技术变革传入非洲、中东和除了俄罗斯最西部以外的所有地区的失败形成鲜明的对比。

对于这一局限，在欧洲及其近邻之间，有一个显而易见（但并非充分）的原因就是宗教的不同。在全欧洲的大多数地区，19世纪之初人们就能见到罗马天主教和各种新教教会之间相互和平共处。强调阅读圣经的重要性的新教教徒，在北欧的多数地区缔造了一批确实有文化的人群。在信奉天主教的巴伐利亚、法国、奥地利和意大利北部地区，在某种程度上也存在着这样的情况。这样，随

着人口杂居在同一个地区，操着相同的语言，唱着相同（如果不是同一）的音乐，分发着印刷的祈祷书，新教教会与天主教教会有竞争地互相影响着对方的习俗、礼仪和教育风格。同样，在大多数人口中，神学教义的重要性也在缓慢而稳步地下降，互相通婚已经司空见惯。其结果是，到19世纪初，欧洲文化基本上克服了宗教改革时代形成的宗教分裂。

但在基督教、伊斯兰教和东正教的西方形态之间却不存在这样的相互影响。信仰、习俗和大众文化上的巨大差异，当然就成了工业革命——以及其他许多文化交流形式——为何会在天主教、新教的欧洲、伊斯兰世界和东正教的俄罗斯边界就停止不前的重要原因。然而，光是宗教还不足以说明为什么工业革命只发生在西方信奉基督教的地区。与宗教——或类似人的能力——毫不相关的重要经济和制度的差别已经延续了几个世纪了。举一个例子来说，北欧的气候要求防冻的房子具备玻璃窗户、有合适烟囱的壁炉和能够保持高温而又不至于把住宅点着或冒烟把房主人熏跑的炉灶。建筑材料、冶炼过的金属工具和如何使用它们的知识，早在工业革命前几百年就成了欧洲的共同财富。

历史经验也为欧洲人在与政府当局的关系中适当地发挥个人积极性准备了条件。最突出的、地方政府权力高于教会的制度，是积累了几个世纪长的封建实践才形成的，它包括法庭、书面合同、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彼此义务。在工业革命的前夕，作为一个欧洲农民，不管其权利多么微小，但同俄罗斯的农奴或奥斯曼和北非君主国任何一个非贵族的臣民享有的权利相比，还是实实在在的。到1800年，许多欧洲农民都拥有自己的土地、工具和全部建筑物，或者拥有租期很长的建筑物，其租期相当于产权的纳税期。

欧洲农民还有权利决定是否结婚，因而就能够考虑好家庭经济。他们可以推迟结婚，以便积累资源，教育子女学习经营，把财产留给他们的孩子，移民以寻找经济机会，等等。因此，很大一部分人群都有很强的个人自主意识和责任意识，这对于工业革命的迅速和成功的推广，尤其是对于市场经济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这些在邻近的伊斯兰和东正教社会并不完全丧失的品质，却仍然

成了特例而不是常规。

工业革命，精确科学的迅速发展，以及以新发明的形式表现出来的科学应用彼此相互促进，贯穿着整个19世纪。用一位主要的英国经济史学家的话来说就是：

西门子—马丁炼钢法是由来自德国、法国和威尔士的人共同创造的；汽车是由帅勒努瓦、休冈和奥托于19世纪60年代，以及德国和法国的戴姆勒和本茨共同制造的；石油勘探催生了快速钻头（德国，1895年）、金刚钻（荷兰和美国，1905—1915年）、扭力天平（匈牙利，1890年）、地震仪（德国，1919年）和旋转液压钻头（法国，1846年；1919—1920年得到改进）。^①

促进欧洲统一的一个更为重要的因素是艺术和音乐生活几乎完全国际化的气氛。巴黎、伦敦和罗马成了画家、雕塑家、舞蹈家、音乐家、杂技演员和魔术师的传统中心。维也纳、布拉格、布达佩斯、慕尼黑、柏林和华沙在19世纪期间热情地参加了进来。米兰从19世纪初开始和巴塞罗那于19世纪的最后几十年成了歌剧生产的国际中心。伟大的匈牙利钢琴作曲家李斯特（Ffanz Liszt）在魏玛公爵领地当了十年的舞台和音乐指挥。在他漫长的一生中，他把音乐会的巨额收入的很大一部分用来资助有天才的年轻艺术家的成长。据我们所知，没有人要求他出示过护照。^②

但伴随着工业化迅猛发展起来的蒸汽船、电报，尤其是正在寻找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的资本剩余，也给世界上欠发达的地区带来了越来越多的利益。开始时，似乎对每个人都充满了机会：英国人在印度、缅甸和中国；俄国人在中亚和西伯利亚；英俄之间按商定的利益范围在波斯和阿富汗；哈布斯堡帝国在东南欧，显然成了奥斯曼帝国的当然继承人；法国在非洲和亚洲；西班牙和葡萄牙在非洲。所有国家大体上都是根据它们相应的军事和经济实力来行事的。

① Sidney Pollard, *European Economic Integration, 1815-1970*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1974), p. 90. E. L. Jones, *The European Miracl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② Alan Walker, *Franz Liszt: Volume One, The Virtuoso Years and Volume Two, The Weimar Years* (New York: Knopf, 1983 and 1989).

以上大多数地区，或者由于气候，或者由于人口密度大，没有成为欧洲人重要的移民区——只有两个重要的例外，那就是法国人在阿尔及利亚定居和俄国人在哈萨克斯坦和西伯利亚定居。在贸易和投资方面的激烈竞争是有限度的，对英国和法国来说相当明显。与此同时，所有欧洲强国都认为它们正在给世界上的“欠文明”地区带来基督教的恩惠和科学。总的来说，在他们的传教、探险和医学活动中，合作与竞争兼而有之。

然而，在1871年诞生了一个完全崭新的地区性强国——德意志联邦帝国，破坏了主要国家之间现有的平衡。普鲁士王国经过短短三年相对来说是非破坏性的战争之后，从丹麦夺取了古勒苏益格的公国（1864年），把哈布斯堡帝国从现在的德意志联邦中驱逐了出去（1866年），又向法国夺取了阿尔萨斯和洛林的一部分（1870—1871年）。

首先，普鲁士首相奥托·冯·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在这些辉煌的小战中取得了奥地利的合作。其次，他在如何称呼石勒苏益格新的地位这一微不足道的技术性问题上又同奥地利争吵了起来。最后，他把从带有和平倾向的君主——威廉国王——那里拿来的，适度强硬的电报进行了修改，使它变得激烈起来，似乎国王受到了侮辱。这封有名（或者说不光彩）的埃姆斯“急电”导致了暴躁而自负的拿破仑三世宣战，而俾斯麦对此早已打定主意，它成了普鲁士统一德国的序曲。经过军事上的速胜之后，俾斯麦不仅兼并了阿尔萨斯，把50亿金法郎的赔款强加给富有的失败者，而且在凡尔赛宫镜厅（The Hall of Mirrors）宣布成立新的德意志联邦帝国。这样，他成功地使法国这个数百年以来的欧洲大国蒙受了军事、政治和金钱上的巨大耻辱。

在德国占压倒多数的历史学家——还有相当一部分欧洲的历史学家——看来，俾斯麦堪称为一位伟大的政治家。本作者也认为，他似乎是一个温和的典范，尤其跟他的后继者威廉二世和希特勒相比。的确，他集残暴与精明于一身，接下来我就要谈他的温和一面，他是恰如其分的。不管大家对俾斯麦的赞颂是出于真心还是言不由衷，要想了解20世纪欧洲悲剧性的历史，你就必须认识到，

一个最伟大的强国是凭借欺骗和军事成功巧妙结合才得以诞生的。三场短暂的战争使人们对新兴统一的德国产生了恐惧和疑虑，它严重地影响了20世纪的历史。

俾斯麦完全意识到，对他速胜造成的恐惧意味着什么，他也认识到，如果不缓解这种恐惧对德国来说是一种潜在的危险。对此，他在巴尔干通过经济和外交手段支持奥地利人，并成功地安抚了他们。他把建立“三皇同盟”作为消除俄国人疑虑的手段，并且同俄国和奥地利共同分享波兰和巴尔干的和平领地。他谨慎地在非洲和东南亚鼓励法国帝国主义。他一而再、再而三地把新兴的德国说成是“令人满意”的大国。他默默地坚持而非咄咄逼人地要求得到非洲殖民地并且不做挑战英国海上霸权的事情。

俾斯麦还起到了某种“欧洲协商”非正式主席的作用。1878年，俾斯麦在一场把奥斯曼、俄罗斯和年轻好斗的保加利亚公国卷入进去的危机中充当了诚恳的调停人的角色。1884年，他主持会议，把广大的刚果领土划到小而富饶的比利时王国的主权之下。当德国在西南非、喀麦隆和坦葛尼喀建立殖民地时，他对英国刚柔并用。就这样，到19世纪80年代末，非洲所有值得弄到手的国土（以及中东和亚洲许多最富饶的土地）都已经置于欧洲人的旗帜之下，或者成了欧洲大国的“势力范围”。

从1862到1890年，俾斯麦操纵了普鲁士，然后是新德意志联邦帝国的命运。但第二年，年轻的威廉二世解除了他祖父任命的专横但却谨慎的首相。从此以后，德意志再也不称自己为“令人满意”的大国了。相反，它积极扩大在非洲的势力范围，广泛参与角逐在中国的商业租界，开始建立海军，旨在挑战英国对海洋的控制。从1890到1914年，所有外交官和军官（即使不是所有政治家）都知道，欧洲的主要国家正在卷入军备竞赛，并且正在形成日益密切的军事同盟。

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有几十个有能力的历史学家研究过19世纪末欧洲帝国主义的发展历程，军事同盟的形式，以及这两个进程之间的紧密关系。对

于知识分子来说，他们的个人竞争很少超出网球场的范围。他们的提拔和升迁，很少超出大学里科系的范围。永无休止地迷恋威胁、许诺、陆海军伪装、金融政策、掌权亲王的个人性格、重要的首相、外交部长、偶尔光临的关键大使，他们的判断和意图进入了外交和军事的决策。没有哪种棋局比研究生活在可怕恐惧中的人们的动机更复杂和更捉摸不透的了。一旦“大战”——尤其是一旦大屠杀结束，主要当事人都迫不及待地他们的官方报纸和官方回忆录中，指责他们的敌人误判或有勃勃野心。

故事的有效叙述，来自于许多人的观点，资料也来自好几个国家的档案馆。细节过于复杂，真是一言难尽。但主要的发展线索仍需加以讨论，因为大约从1880年开始，国际化和工业革命的合作方面就逐步而不可逆转地让位于与日俱增的、根本上是好战的、民族主义的竞争了。

我们不妨把各个大国的利益逐个归纳一下：英国决心要维持它对海洋的支配权和在世界贸易和投资中的主导作用。英帝国的领地无论对它的安全或是对它的威信都是重要的。但英国完全准备同其他“先进”国家分担“白人的负担”。对于欧洲，英国避免使用军事手段，但对欧洲可能被单一的国家支配，却时刻保持着警惕。其他事务也一样，英国总认为自己赞成发展、政治自由和我们今天称之为意大利、希腊和巴尔干的人权。

法国同样关注在非洲和东南亚的贸易、投资、基督教的“文明使命”和法国文化。平心而论，英国经济上比它强大，帝国版图比它辽阔，德国迅速取代它作为欧洲主要强国的地位，这个事实正激励着法国人全力以赴地去维持他们国家在欧洲以外的帝国和文化作用，捍卫独一无二的、使用法语作为外交语言。法国人还拥有前奥古斯丁罗马留下的、第一共和国非贵族的帝国。

俄罗斯决心维持对波兰和芬兰的控制，从奥斯曼帝国逐步解体中分赃，希望作为最新成立的塞尔维亚王国和保加利亚公国特殊保护者的地位能够得到承认。这最后一个目标，使俄罗斯同奥地利不断发生口水战。这个国家过多的精力也使它稳步卷入了对西伯利亚、中亚、里海和阿富汗南部的扩张。英国急于